

凝视理论视域下《都柏林人》女性角色的悲剧性解析

李思颖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都柏林人》是詹姆斯·乔伊斯经典传世的文学作品，刻画了二十世纪初期都柏林中下层民众的群像，尤其展现了爱尔兰男权社会压抑的氛围下女性的悲惨处境。本文借助凝视理论，解读《伊芙琳》《一朵小云》《泥土》中的女性形象，探讨她们如何在男权视角的规训下被客体化，并困于他者化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凝视理论；他者化；都柏林人；女性

DOI：10.69979/3029-2735.25.4.099

1 研究背景

詹姆斯·乔伊斯在其创作生涯早期完成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通过十五个叙事单元，呈现了在封建势力以及宗教教义的束缚下都柏林普通民众的生活场景和个人命运。小说中，女性角色占据重要地位，她们在琐碎而压抑的日常生活中苦苦挣扎，成为男权社会压迫的典型缩影。乔伊斯刻画了这些女性无法自主的命运——她们被社会无形的力量所压迫，在既定的轨道上举步维艰。通过描述她们在无聊且无望的市井生活中的挣扎，乔伊斯对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处境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本文基于凝视理论，以《伊芙琳》《一朵小云》《泥土》三篇为例，展现不同年龄阶段的爱尔兰女性在当时的父权制社会背景下所遭遇的凝视和他者化，以及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伊芙琳在父权压迫与自由幻想间徘徊；安妮在丈夫钱德勒的凝视中被降格为精致的玩物；心地纯良的玛利亚因大龄未婚且生计艰难的状况而陷入一种尴尬的境遇，成了父权制社会中的边缘人。

2 理论阐述

传统意义上的凝视指人的眼睛的视觉功能，可以发出“凝视”“注目”“眺望”等观看动作。后期凝视的概念逐渐异化发展，它成为发起者对承受者通过视觉作用施加的一种权力运作。凝视理论的核心在于剖析视觉交互下的社会权力体现，研究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探索如何通过视觉行为来建立和维护社会权力的组成结构。凝视体现并强化权力，使观察者处于一种支配地位，彰显且巩固了观察者的权威，使被观察者被动处于被控制和被支配的地位。^[1]从存在主义学者萨特到福柯再到拉康都对凝视这一内涵作了不同的解释和延伸。米歇尔·福柯在他的研究中阐

述了视觉手段如何实现监视和控制，如何塑造驯顺的身体。他在著作《规训与惩罚》提出被统治者如何在统治者“温柔的暴力”的实施下所臣服，因而提出“全景敞视监狱”这一概念，即罪犯的一举一动都无时无刻不呈现在监视者眼前，而罪犯对此无从得知却又不得不顺从，这就体现了视觉权力的作用；雅克·拉康则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剖析了凝视在主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由此提出“镜像理论”，主体误把镜中的自己当成了真实的自己，即主体的异化的表象；劳拉·穆尔维提出“男性凝视”这一概念，将女性形象塑造成男性观众的视觉对象，置女性于视觉服从的位置。由凝视理论延伸的核心观点之一“他者化”，是指凝视的权力运作将某些群体或个体边缘化，视为“他者”，而非主流社会的组成部分，从而强化主流社会和掌权者的中心地位和权力结构。^[2]凝视中的他者化现象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凝视的内涵早已超越了视觉文化的范畴，实质是权力控制和文化建构的工具。

3 《都柏林人》中权力目光下的女性囚徒

3.1 顺从与逃离——进退两难的伊芙琳

在《伊芙琳》的叙事结构中，女主人公的逃离企图呈现为一场存在主义式的抉择困境。表面上看，伊芙琳面临的是物质保障与精神自由之间的简单抉择，实则深层折射出男权社会对女性主体的系统性规训。^[3]小说中，女主人公伊芙琳想要和男友弗兰克私奔，摆脱父亲与家庭的精神控制，去追寻自己想要的幸福，但她又有太多的顾虑。物质上“在家里，她有吃有住，还有那些从小相亲相爱的家人”，精神上“一旦店里的伙伴发现她与一个男人私奔了，会怎样议论呢？或许会说她是个智商低下的傻子吧”。波伏娃阐述的“第二性”处境在此具

象化为双重束缚：既需要承受“私奔即道德败坏”的社会胁迫，又内化了这种道德审判形成自我约束。在当时的男权社会，女性作为“第二性”，被迫拥有比男性更多的道德束缚。一个女人擅自和男人私奔是被遭人唾骂的秽德丑行，来自四面八方的议论与道德谴责会使想要追求自由的女性丧失勇气。长期在这种社会氛围的浸染之下，女性会潜移默化地接受这样的价值观，自觉地约束自己，从而逐渐被男权社会他者化。看似“温饱无忧”的理性计算，实则是精神奴役长期内化的结果。当伊芙琳担忧被看作“智商低下的呆子”时，她已然将男权社会赋予女性不公正的价值标准当作约束自己的标尺。^[4]

“全景敞视”是福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一个环形建筑被分为很多囚室，囚室中的罪犯被时时刻刻置于监视者的观察之下，而他们却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被监视。小说中开头和中间提到两次“她的头靠在帘子上，鼻子嗅到满是尘埃的窗帘布的味儿”“该走的时刻快到了，她依然坐在窗边，头靠着帘子，嗅着满是尘埃的窗帘布的味儿”，“布满灰尘的窗帘”构成福柯式全景敞视监狱，暗示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权社会在时刻监视伊芙琳的一举一动。父亲暴力的胁迫感和圣女图的宗教凝视形成双重监控从而束缚抑制着伊芙琳，伊芙琳逐渐内化父权社会对女性道德的规范与要求。窗帘尘埃的气味由此被赋予多重内涵：既是家庭空间的禁锢痕迹，又是精神枷锁的嗅觉印记，更是主体性消散的生存状态。

3.2 沉默与缺席——被物化的安妮

小说《一朵小云》中，钱德勒是一个有文学抱负的小职员，对眼下的生活并不满意，没有建立起和谐的家庭关系，而他的妻子安妮在故事中并没有直接出场，主要通过钱德勒的视角来呈现。这意味着安妮的形象被钱德勒的主观视角所塑造，存在被客体化。^[5]劳拉·穆尔维在1975年提出“男性凝视”这一概念。穆尔维在她的著名文章《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指出，传统好莱坞电影通过镜头语言和叙事结构，将女性形象塑造造成男性观众的视觉对象，从而强化了性别不平等。在这种凝视中，男性作为观众和控制者，女性则被物化，成为被观看和享受的对象。而《一朵小云》中的女性角色便处于被男性凝视，被物化和他者化的困境。比如钱德勒对安妮的描述，“瓷器般脆弱”，“和安妮一样，这些家具也是美观而拘束的”表明他将安妮视为易碎物品，美观的家具，而非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这种比喻可能反映了男性将女性视为审美对象，而非具有自主性的人。

小说中还描写到“小钱德勒望着，凝视着她那紧抿着的一线薄唇。她穿的是一件淡蓝色的夏季罩衫……这件衣服花了他十磅又十一便士，并且为它破费心思，多么心烦！”这表明钱德勒并不给予安妮尊重，未将她放在应有的与他同等的位置上，并不觉得安妮值得这十磅又十一便士的衣服，也不值得他花心思，可以看出男权社会下男女地位的极度不平等。小说中“他淡淡地盯着相片上的那双眼睛……这双眼睛很漂亮，面孔也很漂亮……为何表情这么木呆呆的，故意扮出一副贵妇人的模样呢？眼光那么澄静，令他厌烦……那些东方女郎黑潭般的眼眸，充满激情，流露出诱惑人的情感……为什么他那时要娶那双眼睛呢？”可以看出钱德勒已经见异思迁，对妻子安妮毫无感情可言，眼中并不是爱的欣赏而是冷漠地凝视和审判。小说中还提到“打扮妖娆的淑女下车后……她们的衣服五彩缤纷，披着披肩，戴着头巾，每位女士脸上都是浓抹艳擦，脚尖一踮地，就马上撩起裙角”，这些对女性的描述都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女性则被迫接受这种不友好的凝视行为和被物化的结果。

凝视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他者化”，是指通过凝视将某些群体或个体边缘化，视为“他者”，巩固和强化主流社会掌权者的权利和地位。安妮作为家庭主妇，她的存在可能被限制在私人区域，承担家务和育儿责任，而钱德勒则在外工作，占据公共空间。比如小说中对安妮的出场描述只限制在家中照顾孩子打扫家务，而钱德勒却可以四处闲逛外出交友寻欢作乐。这种性别分工体现了父权制对男女分工标准的不平等，对女性生活中的种种压制，即将她们限定在特定的社会角色中，被彻底的他者化和边缘化，也强化了男权社会的中心地位与权力。男权话语将她们打造成“快乐主妇”，以牺牲美学将其禁锢在家庭祭坛之中。^[6]另外，安妮的沉默与出场的缺席的直接描写直接表明她被边缘化，失去了话语权，也没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主体性。她的形象一直由钱德勒描述，而不是由本人主观呈现在读者眼前，这本身就是他者化的表现，说明安妮的存在依赖于男性的视角，缺乏独立的声音。小说中“小钱德勒回家太迟了，耽误了吃茶点，且他忘记去比尤利食品店买一袋咖啡给安妮带回来”这一情节也表明钱德勒对安妮的忽视，并不把她放在心上，从而导致其边缘化的结果。

此外，小说对钱德勒家庭的环境进行了细节化呈现，比如“桌上放有一盏白瓷罩的小灯，柔和的光辉照亮了牛角框里的一张相片”“房间里的漂亮家具和摆设也有小家子气的性质，那是安妮亲自挑选的”“家具美观而

拘束”。钱德勒家中的布置，暗示了男权社会将女性彻底打造成“家中天使”，物化女性为持家工具。安妮通过装饰家庭环境来满足社会期待，但也限制了她的自我发展，逐渐将自己束之高阁，隔离在主流社会之外。同时，钱德勒对朋友加拉赫的成功感到嫉妒，并将自己的挫败感归咎于家庭中。小说中“这又使他想到了安妮。和她一样，这些家具也是美观而拘束的。他内心升出一股木木的反感，对生活的厌倦。他能逃出这个家庭吗？”，从这段话可看出钱德勒更多地将他的不满抱怨到安妮身上，安妮被他视为追求理想生活的障碍，这种压迫进一步巩固了安妮作为他者的地位，她的价值被贬低为家庭附属品。

3.3 衰老与焦虑——被异化的玛利亚

小说《泥土》中女主人公玛利亚是一个在洗衣房工作的中年未婚女性，她的生活相对封闭，社会地位较低。乔伊斯通过玛利亚的形象，尖锐揭示了维多利亚时期爱尔兰社会对单身劳动女性的双重压迫。洗衣房这一封闭的工作环境，隐喻着社会为“逾龄未婚”女性预设的生存边界。^[7]她参加万圣节聚会，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最终在游戏中无意选中了象征死亡的泥土，而不是传统的戒指或祈祷书，这些象征性选择，则构成残酷的性别寓言：戒指（婚姻）、祈祷书（宗教）与泥土（死亡）的三元对立，实际上界定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合法存在方式。玛利亚对泥土的“偶然”选取，恰恰暴露了这种既定合法存在方式的不公平与暴力性——当女性无法进入前两种社会认可的范畴时，便被自动归入象征性死亡的范畴。这暗示了玛利亚被男权社会边缘化的命运。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往往成为被凝视的对象，被物化和他者化。玛利亚的未婚状态可能使她成为社会中的异类，尤其是在当时父权制社会背景下，未婚女性可能被视为反传统甚至是异类。洗衣房这样的工作环境也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房间，更加隔绝了她与主流社会的接触。在万圣节聚会上，玛利亚被要求参与游戏，而游戏结果，即她选中泥土，可能象征着她被社会视为异类的存在。此外，玛利亚也遭遇了男权社会的他者化，剥夺主体性和话语权。玛利亚因为年长单身而无法融入传统的家庭结构，男权社会对她的存在视为对规范的威胁和挑战，由此被忽视和排斥。玛利亚在聚会中的互动也反映了男性对她的态度。比如她总是被男性以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所对待，她的被动顺从和屈服进一步巩固了她

在男权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从属位置。

4 结语

在《都柏林人》的叙事篇章中，伊芙琳、安妮与玛利亚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轨迹，实则构成了一个相互映照的性别政治谱系。这三个女性形象分别代表了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爱尔兰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主体性困境：伊芙琳的人生抉择暴露了青年女性在封建观念内化后的精神瘫痪；安妮的婚姻生活揭示了中年女性在家庭空间中的全面性失语；玛利亚的边缘化生存则展现了晚年未婚女性在主流社会中的结构性排除。乔伊斯展示了在男权话语以及宗教话语占主导地位的爱尔兰社会，都柏林女性无论是青年、中年还是晚年都无法摆脱社会主流力量的裹挟，丧失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而被动变成了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她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他者的凝视中不断地约束着自己的行为；在社会话语权力的压力下被迫放弃自己的应得利益，压抑自己的感受；在一条条的女性行为标准的规训下渐渐失去了她们的主体意识，将自己的主体性献祭给父权制的神坛。

参考文献

- [1] 高英梅. 凝视理论视域下的玛格丽特·劳伦斯小说《上帝的玩笑》[J]. 英语广场, 2023, (28): 52-56.
- [2] 李晓珩. 与他者之睹共存：用萨特的他者理论读乔伊斯的《都柏林人》[D]. 汕头大学, 2021.
- [3] 张梓航. 凝视、话语、规训——从福柯的权力理论视角分析《都柏林人》中女性的命运[J]. 青春岁月, 2023, (05): 44-46.
- [4] 吴素梅. 《伊芙琳》的及物性分析与人物塑造研究[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12, 22(3): 64-67.
- [5] 宗小妮, 张亚婷. 精神瘫痪的生活囚徒——精神分析视角下对《一朵小云》中小钱德勒的解读[J]. 名作欣赏, 2023, (24): 95-97.
- [6] 彭珍珠. 《都柏林人》中的女性形象[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1): 73-75.
- [7] 崔莉. 蒙着眼睛的玛丽亚：《泥土》的症候阅读探析[J].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6(3): 29-31.

作者简介：李思颖，女（2000-10-11），汉族，河南漯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英国文学